

《史記》論析六章

Six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吴淑惠 著

Shu-hui W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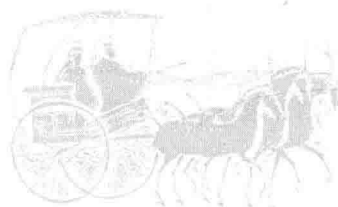


《史記》論析六章

Six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吴淑惠 著

Shu-hui W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論析六章 = Six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 吳淑惠著.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95-6749-2

I. ①史… II. ①吳… III. ①《史記》—研究—文集 IV. ①K204.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1222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12.25 字數：28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1 500 冊 定價：39.8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序

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歷史系吳淑惠教授所撰寫的《史記論析六章》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學術著作，其誘人的理論思考，頗富創意的探索，嚴謹細密的論析，以及廣博深刻的見解，讀後會給人以強烈的感染，並使人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啓示。

司馬遷的民族一統觀是備受人們關注的《史記》研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國內一般的論者大體上都是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其加以論析的：一是追溯重要諸侯國和邊境民族的祖先，與中原主體政權一樣，其最原始的血緣關係均出自黃帝族系。二是秦始皇通過武力征服，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分裂局面，使整個國家得到了重新統一。三是陳涉起義，項羽滅秦，劉邦建漢，延續而至漢武帝以武力征服四方少數民族地區，拓展邊境，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疆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在這個基礎上，吳淑惠教授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思考力，別出心裁地以“中國人”為視角，對這個問題提出了頗具理論價值的新穎見解。大體的論析是：黃帝族系統一了原始的中國，在中原地區建立起中央政權，相承襲而後有夏人、商人、周人。周代政治分封，受封諸侯移民到達其所受封的邊遠地區，以征服和文化融合的方式，使當地的戎狄夷蠻順服，因而得有齊人、魯人、燕人、楚人、晉人等的稱謂。待秦

始皇在各諸侯已相互兼併的基礎上統一六國，將六國之人、秦人與帝國初期再征服的蠻夷狄戎，“更名民曰黔首”，而其統治下的所有民衆則爲新秦人。漢代建國後，武帝在拓邊的過程中，以臣、內臣、外臣（與外國相對）的方式整合全國所有人而改“黔首”稱“齊民”。由此統一的多種舉措，使最初的中原人演變而定義全體屬下居民成爲了“中國人”。通過如此表述也就明確而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從何而來，又是由什麼人組成等多方內容。這個論說的價值，首先在於它不僅豐富充實了一般論者的評析內容，而且使一般的評析獲得了貫穿於三者之間的精神文化因素，從而使其顯現出在歷史變化中不可動搖的本質光芒。其次，這種論說使黃帝血緣與邊境戎狄夷蠻相結合，政治變動與人員身份相結合，武力威逼與彼此趨附相結合，中原主體與長期歷史演進相結合，充分表現出民族凝聚精神蓄積過程中所能具有的無限生命力及其輝煌成就，故其評說的理論指導尤爲振奮人心。第三，論說的着眼點在“人”，以人在歷史中的身份變化來論證民族一統大業的偉大成就，這一觀念的產生，對於說明“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提供了又一個強有力的論證依據。離開了“人”自身實踐中的政治、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諸多作爲，民族國家一統的理想則無由實現。故本文所具有的理論意義不可忽視。

選擇依據重要歷史階段人物的活動，系統論述“參彼己”“互見法”與“虛實法”共同成爲司馬遷“寓論斷於敘事”的三大表現手法，是吳淑惠教授著述的又一重要創獲。她不僅指出“參彼己”所由憑借的如上書、諫說、論辯等多種途徑，還以縝密的觀察，提出司馬遷是分層次地“安排”出不同品質的人物發表意見，以闡述他們對不同層次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辦法，而這些人物諸多言論的背後，常常顯示出原是司馬遷想要表達的看法。如此論述是完全符合司馬遷寫作《史記》的

原意的。而在這裏，“安排”一詞特別突出，它恰當地傳遞出一位優秀史家在敘述客觀歷史真實的同時，還能準確地將個人的撰史意圖運用熟練設計的編纂技巧，轉述給參閱的讀者而不露其主觀的痕迹。文篇選擇依憑論述的重要歷史時期，正是《史記》總體記述內容中最豐富並最具代表性的階段，故論說充實有力，且運用多方面、多層次的觀察視角進行評述闡發，以見“參彼己”手法的廣泛存在，亦充分表明了其在司馬遷撰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及學術價值。

文章以充分的考辨，論析《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前半的作者是司馬遷，並要求肯定“司馬遷創此表的功績”。在談及此表的特色時，吳淑惠教授強調“倒文的功用是在反映與襯托變化”，具有指引讀者進行參閱思考的價值，而提欄又與倒文息息相關，相互之間有“從事找人”，又“從人找事”來回反復的方便效果。對“倒文與提欄的發明是司馬遷身為史家、編纂者、圖書管理者的學識與經驗之綜合成果”，給予了積極贊揚。對於全表內容的闡釋，她是結合整個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來論述漢代政治權力的轉移與起落所反映出的貴族與官吏地位的更換和變遷，從而也顯現着司馬遷自身以“功”重尊卑、定尊卑的思想原則。尤其是關涉到漢武帝時期的中央用人政策的改變與後果，有力地揭示出類似於君權專制狀況出現的必然，具備深刻的論說啓迪意義。實際上這種闡釋所引發的歷史性的綜合考辨，具有很强的學術生命力，是遠遠超出涉及關於此表真偽性的一般評論，從而表現出文篇作者的獨具識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記》研究開始步入新時代的繁盛高峰，但在總體形式上大約經歷了宏觀研究、具體研究與細微研究三個階段，水準越來越高，課題越來越廣泛，手段越來越多樣化。當然三種形式也不是絕對明顯分隔的，它們在不斷深化的基礎上，一直是彼此促

進，相互滲透包容的，而使研究結果長時期展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這是可喜的。本書著述作者在撰寫了關於“中國人”“參彼己”這樣的宏文之後，又對《史記》中的“太史公曰”這一重要的評論形式產生了濃厚興趣，從而分別在第四、五、六章進行了熱烈的探討。其一，以其中的第一人稱代詞“余”和“吾”為中心，通過研究其各別的應用，及其所帶引諸動詞的相關整理、分類，從而探尋其內在規律性，論證司馬遷所具有的史家與史評家的雙重身份，及其寫史與論史之技巧的多元性。其二，視其中使用的感嘆評語，為司馬遷運用的一個重要層次的論史方法。通過研究其諸多表現形式中所蘊含的特殊功能和強烈效果，以揭示太史公個人情緒的傳達，傳統特色的應用，人品之聖仁德智的分析，用人之內質和機遇的論定，以及生死榮辱的思考，天道不公的呼喚等的撰述意圖。其三，在關於《漢書》“贊曰”與《史記》“太史公曰”的感嘆評語的比較和論析中，除明確指出班固與司馬遷之間存在的天道觀念、政治見解、撰述手法、個人際遇、時代特色等的諸多差別以外，對彼此的承襲關係和班固未能努力創造出新的風格作出了論定，以此強調“專業史家”產生的歷史進展與特殊意義。三篇文章的撰述，表現出著作者文學的敏感性，縝密的觀察視角，細緻認真的體味分析能力，以及其可貴的論史激情。其所散發的新鮮時代氣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領學術風向的效果，將使讀者從中獲得許多教益。

吳淑惠教授文史專業知識豐富，學術根底雄厚，聞見廣博，思維深刻且富文字表現力，於相關專題國際國內的專業討論深度及其諸多古今著述成果均瞭然於心，運用自如，引述清晰明確；作風嚴謹，並具創造才能；意蘊溫雅，表述灑脫。此次著述結集問世，可以擴大國內《史記》研究者的視野，也使大家欣賞到美國學者相關研究的高度及其論述風格，對促進《史記》研究是很有幫助的，值得稱贊！《史記》是世界

性的文化學術遺產,早已扎根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培植之中,影響深遠。以此,我們希望並歡迎能有更多的國際友人和文化知名人士,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他們對《史記》的研究見解與成果的同時,盡可能用中文在國內出版他們的著述,讓我們能夠領略他們的風采,並活躍我們的學術研究氣氛,以提升整體的《史記》研究水準,共同為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做出有益而積極的貢獻。

僅此,熱烈祝賀本書的出版,並真誠地向廣大讀者予以推薦!

楊燕起

2015年3月26日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目 錄

contents

第一章 《史記》中的中國人：兼駁近年來西方學者有關司馬遷的民族觀之論述	1
一、秦統一前中國之人的由來與組成	9
二、秦漢統一後的中國人	37
第二章 參彼己：司馬遷論史的表現與內涵	55
一、以秦史為中心	60
二、以秦漢之際為中心	81
三、結語	123
第三章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新論	125
一、表十的真偽說與作者論	128
二、表十的結構與特色，兼對標題與倒文提欄的論析	140
三、表十倒文的內容	149
四、西漢朝權力的嬗替	159
五、表十與出土的漢簡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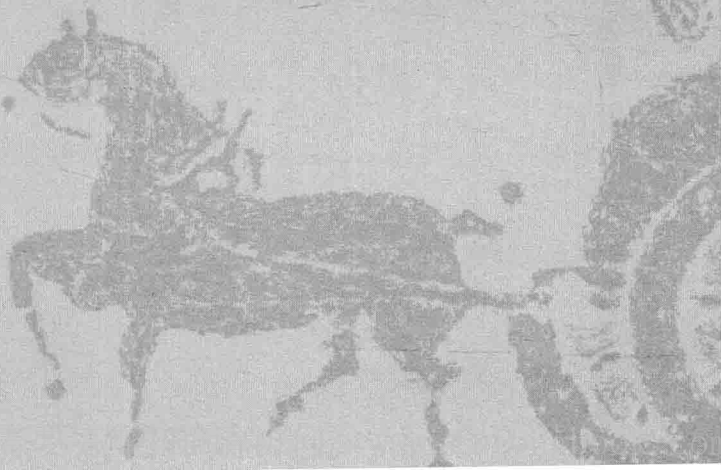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史記》“太史公曰”中的第一人稱代詞“余”與 “吾”之應用和意義	169
一、“余”或“吾”連接行動詞類	172
二、“余”或“吾”連接感官/反應動詞類	178
三、“余”或“吾”連接“讀”動詞	186
四、“余”或“吾”連接寫作動詞類	190
五、“余”和感受/感嘆動詞類	200
結論	204
 第五章 《史記》“太史公曰”中的感嘆評語	205
一、感嘆評語列表舉例	210
二、感嘆評語表內容之綜合分析	260
三、附《報任安書》中的感嘆評語	279
 第六章 《漢書》“贊曰”與《史記》“太史公曰”的感嘆 評語之比較與論析	283
一、《史記》《漢書》共有章卷中之“太史公曰”與 “贊曰”內所使用的感嘆評語之比較與論析表	287
二、《漢書》《史記》類傳中的“贊曰”與“太史公曰” 所含之感嘆評語表	343
三、《漢書》中《史記》所無之章卷的感嘆評語表	356
結論	379

第一章

《史記》中的中國人：兼駁近年來西方學者 有關司馬遷的民族觀之論述

司馬遷首創“中國人”一詞。這個集體概念名詞 (collective meaning) 代表他大一統的民族觀念。從上古三代的夏人、商人、周人，到先秦時期的晉人、齊人、燕人、秦人、楚人、吳人、越人等，進而到秦帝國的黔首和漢帝國的齊民，《史記》逐步展現“中國人”這個大民族的凝聚力之形成。本章就現有之《史記》版本探討司馬遷心目中的“中國人”之如何定義，“中國人”是從何而來，又是由什麼人組成的。筆者同時簡要地介紹近年來西方學者有關司馬遷民族思想的著作，力圖對其論斷的是非得失作出評價。

(原文《談史記中的中國人》，曾發表於《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2 年第 10 卷與 2013 年第 11 卷)



每一位研究《史記》的學者都希望能設立出某種理論，可是往往如楊燕起教授曾言，心中底數不大，主要是不知道在理論上能不能說得通。^① 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司馬遷在寫作時常將關鍵字眼藏於詞句之中，而且不太反復使用。雖然許多有關特別字詞的理論都以敘述的方式反映在《史記》篇章裏^②，但是讀者和學者很難察覺到他的實際意圖。舉一二個明顯的例子，如“中國人”（97:2697）和“參彼己”（110:2919）這兩個名詞。它們都不常在《史記》中出現，但是幾乎篇篇都與它們背後的理論相關。前者反映司馬遷塑造代表“中國人”的整個歷史過程，後者顯示司馬遷以“說”的寫作方式表達他觀察正反雙方的情況，來敘述事件或人物的兩面，以此討論他對文化、政治、軍事、民族等方面的看法。現於本章與第二章分別從這兩個名詞展開探討有關司馬遷對民族聚合與寫史方法的理論。

漢高帝十一年（前 196）劉邦遣陸賈前往南越說服南越武王趙

① 參見楊燕起《〈史記〉和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史學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25 頁。

② 全書中之《史記》（1982）、《漢書》（1962）、《後漢書》（1965）均以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年印刷本為底本。正文中《史記》引注以（卷數：頁數），《漢書》引注以（HS 卷數：頁數），《後漢書》引注則以（HHS 卷數：頁數）表示。《春秋左傳注》（1990）也以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印刷本為底本。

佗(尉佗)接受漢朝的南越王封號,並放棄與中國為敵。根據司馬遷的敘述,陸賈是用三個論點誘迫尉佗就範的。陸賈先以誘勸:“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接着示以威脅:“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復手耳。”最後以勢逼:“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97:2697—2698)

陸賈以三種不同的方法圍繞着“中國人”這一集體的血緣概念說服尉佗。事實上尉佗“為南越王稱臣奉漢約”只是因為他“大說陸生”(大概因為給了他南越王的稱號)而表面敷衍,並沒有誠心屬漢,更不認為自己是漢代的一個中國人。在他長壽的一生中,尉佗併吞桂林、象郡,役屬閩越、西甌、駱。統治的地域東西萬餘里,約今之福建、廣東、廣西東部、湖南南部,和越南北部等廣大地區。並且他發布命令,使用車駕一如漢朝的皇帝。終劉邦、高后、文帝之世。漢朝對尉佗是無可奈何的。一直到景帝時尉佗才稱臣使人朝請。但最多只有對漢天子才“稱王朝命如諸侯”,南越依舊“居國竊如故號名”。到武帝時漢朝才以武力兼併南越,而漢與南越近百年的爭鬥才塵埃落定。

有關陸賈這段歷史的敘述,關鍵在於它在漢朝與南越國的交涉中,表明了司馬遷有統一的漢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集體的概念

(collective meaning), 並且給予了一個“中國人”的稱呼。這一通稱是在《史記》之前的各史書中所沒有出現過的。而在《南越列傳》中司馬遷重複這個“中國人”的概念(譬如強調南越太后乃中國人也)。因為在《史記》其他 129 卷中沒有再出現這個專有名詞^①, 而且也不稱呼漢朝的中國人為漢人或漢族^②。學者或許會忽略或者無法解釋這種突兀的現象, 而認為《南越列傳》不是司馬遷所作。本章的重心不在論證其章篇的虛實, 而就現有之《史記》版本探討司馬遷心目中的“中國人”之如何定義, “中國人”是從何而來, 又是由什麼人組成的。^③

就《史記》中有關人物的傳記散文來看, “中國人”的形成可以大略從縱向和橫向發展來解釋, 而且不論縱向或者橫向都是隨着歷史的演進而世世迭替、改變。我們依其群體的活動所引起政治、軍事、文化的變化而將“中國人”分為不同的權力層次(power structure), 也就是楊燕起教授所說的社會的五個層次。楊教授將

① 《史記·貨殖列傳》: “夫山西饒材、竹……皆中國人民所喜好”(129:3254), 可視為一例外。其他“中國人”一詞出現在《史記》注釋有兩次: 《李將軍列傳》為《史記集解》所注(109:2868); 《大宛列傳》為《史記索隱》所注(123:3160, 3163), 故不算在內。

② “漢人”這一名詞出現在《史記》有 6 處, 但都不是漢朝統一下的“中國人”之義。如《淮陰侯列傳》: “歸楚, 楚人不信; 歸漢, 漢人震恐。”此為楚漢之爭時, 劉邦為漢王之漢。《大宛列傳》中: “烏孫使既見漢, 人衆富厚, 歸報其國, 其國乃益重漢”(123:3169), 此處句型標點已說明其不是“漢人”一詞。其他三處(第 338、2889、2933 頁)都是《史記索隱》的注解, 故不能算是司馬遷的本意。

③ 漢學家邁克婁一(Michael Loewe)認為每一個創造獨立的文化的民族都遺留了文獻, 以供探討下列幾個問題: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 這個民族的特色如何? 這個民族的貢獻又如何? 回答這些問題, 民族認同的塑造是很重要的。參見 Michael Loewe, “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s,” *T’oung Pao* 80 (1994): 6. 另, 汪高鑫推舉《史記》《漢書》為表現統一民族觀的正統。參見汪高鑫《兩漢正史民族史撰述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 《求是學刊》2012 年第 2 期, 第 140 頁。

《史記》五體看作是一種總的社會歷史的結構，而將整個社會劃分為五個層次：帝王、諸侯、謀臣將相、士大夫、社會的直接生產者。筆者從民族形成的觀點來看，將“中國人”分為統治者（power holders）和臣民（subjects）兩個權力層次。前者包括了楊教授劃分的前三個社會層次，後者則等同於楊教授劃分的後兩個社會層次。其中統治者的權力層次又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變化。^① 楊教授在其文中對社會層次縱向的發展有精彩的分析，本章對此省略討論而專論橫向“中國人”的發展，也就是探討各種不同的民族如何互相吸收融合而變成中國之人，又如何隨着政治文化的演進進而成為司馬遷最後依歸的“中國人”。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不論縱向或者橫向的發展，都是司馬遷民族思想的一部分。

司馬遷寫民族史的首先要務在於闡揚他自己身處的漢朝之民族（a people）。他的民族思想不局限表現於《史記》的6篇少數民族列傳，而是在本紀、世家、列傳等篇章都可見各民族在其歷史的演進中逐漸地形成與凝聚成“中國人”的過程。雖然司馬遷在漢代史中加入了漢朝征服，或者羈縻，或者敵對的周邊民族的記錄，但漢代人本身的凝聚過程才是他最關心的。《史記》自始至終都反映了他面臨政治、文化、民族、疆域大一統的時代，而產生了要為這個

① 統一前帝王臣相是和諸侯分享權力的，統一後諸侯權力層次消失了，但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却增加了一個中間權力層次，這就是以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集團，或者所謂知識統治階層。他們替君主實施統治權，然而也是被統治的群體。關於此論在第三章中有深入的討論。於此略過。余英時教授大作《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言，春秋之前，“士”屬於貴族階級中最低的一層，孔子以後的“士”有不少是從庶人階級上升而來。到了戰國時代，“士”終於不再屬於傳統貴族，而成為四民之首。（《余英時文集》，第4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頁。）

時代代表統一的漢帝國國家統治下(nation-empire)的中國人下一個定義的使命感。^①換言之,司馬遷要讓他那個時代的天下人(包括漢朝的中國與他那時所知道的外國)和後世之人知道漢帝國的人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是經過什麼樣的歷史過程才被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可說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之一是在宣揚創造一個群體的民族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中國人”——的形象,而且這個“中國人”應該是他民族觀的中心。^②

司馬遷塑造的“中國人”之形成可分為兩個階段:秦漢朝統一之前與統一之後。前面已經說明司馬遷只在《南越列傳》中使用“中國人”這個名詞。在《史記》其他章卷中因為歷史時期的不同,於表達統一前的所有中國之人的概念時,司馬遷常使用“天下”或者“中國”二詞表示。譬如“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戎狄以故得人,破逐周襄王,……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110:2882)。此外,《史記》中“天下”這個名詞也傳達

① 王子今《大漢·皇漢·強漢:漢代人的國家意識及其歷史影響》(《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06—420頁)已經討論《史記》《漢書》《後漢書》在寫漢代史時多顯出強烈的國家意識與榮傲。又,筆者認為西方學者所謂傳統帝國國家主義(traditional nationalism based on an empire)在司馬遷的時代已經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帝國國家主義和現代帝國主義(imperialism)意義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② 司馬遷大一統的民族觀是以政治、文化、疆域一統為前提,而且三者是與統一的民族緊密關聯的。參見陳其泰《〈史記〉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學術研究》2012年第12期,第101頁。陳教授文中的中華民族可以看成《史記·南越列傳》中的“中國人”。西方學者對大一統的概念之瞭解,往往只注重政治地理文化的統一,而忽略了民族認同或者凝聚力的部分,如潘友利 Yuri Pines, “The One That Pervades The All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Unity Paradigm,” *T'oung Pao* 86 (2000): 280-281. 潘氏引證了許多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擁有這個看法的西方學者之著作。